

海南省社会科学研究资助课题



胡适 与中国文化转型

■ 宋剑华 著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胡适与中国文化转型

宋剑华 著

(黑)新登字第5号

胡适与中国文化转型

Hushi Yu ZHongguo Wenhua ZHuanxing

宋剑华 著

责任编辑:韩殿发

封面设计:孙少江

责任校对:高质慧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哈尔滨市南岗区花园街158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印刷·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发行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 印张 9 · 字数 210 千

1996 年 7 月第 1 版 · 199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 200

ISBN 7-5316-3019-2/I · 86

定价:11.00 元

序

杨春时

胡适是中国现代史上最有影响、也是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他之所以引起争议，往往被认为是由于其思想的复杂性，这实在是一种误解。胡适的思想是较为单纯的，而且一直很少变化。从“五四”时期直至临终，他都始终坚持文化上的改良主义、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哲学上的实验主义。真正复杂多变的是他所处的历史环境，从“五四”启蒙时期到以后的社会革命时期，历史舞台上的场景不断转换，许多人适应了这种变化，调整了自己的立场、观点，只有胡适依然固守自己的立场、观点，于是就显得不合时宜，甚至有点逆历史潮流而动。共产党人批判胡适，因为他坚持自由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国民党不喜欢胡适，因为他坚持自由主义，反对独裁政治。半个多世纪后，历史场景又转换了；中国大陆搞了改革开放，中国台湾省也搞了“民主化”，于是同一个胡适，又成为热点人物，对他的评价也随之一变。这种历史评价的变化启示我们，胡适研究不能囿于单一政治视角，而应当把他置于中国文化转型的大历史背景中去，如此才能对他的思想立场、历史功过作出公正、全面的评价。宋剑华的《胡适与中国文化转型》正是抓住了文化转型这个视角，使胡适研究有了新的突破。在中国文化转型中，胡适扮演了

世界化的启蒙者、孤独的守望者和坚韧的改良主义者的角色，而通过对这种历史角色的分析、评价，一个清晰、真实的胡适就从历史的阴影中走出来。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胡适同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一道举起了启蒙的大旗。但是，虽然在同一营垒中，同为启蒙者，各自的文化渊源和立场并不相同，因此才有日后的分道扬镳。胡适自幼受业于私塾，接受传统教育；青年赴美留学，受到西方文化的熏陶，从而形成了广阔的文化视野，成为文化领域的“世界公民”。胡适能够以世界化的眼光看待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明确地主张“全盘西化”（后改为“充分的世界化”）。这就是说，他自觉地意识到中国现代化是文化转型过程，只能引进西方文化模式取代传统文化模式。尽管他的西化主张不无偏颇、有失周全（如对待传统文化的继承方面的忽视），但毕竟抓住了中国现代化的关键。相比之下，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都是留学日本出身，他们经过日本的中介接受西方文化，西方文化无形中被日本文化所同化、改造，因此，他们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是有限的，他们的传统文化影响并未根除。留日学生与留欧美学生的差异大抵如此。陈、李、鲁等是站在民族主义立场上看待中国的现代化的，他们也提倡西学，抨击传统文化，但并没有形成世界化的立场和眼光，因此“五四”以后他们先后接受了苏俄传入的马克思主义，投身于社会革命，放弃了西化主张。

民族主义（争取民族解放）与西化（争取文化现代化）之间必然发生矛盾，也就是救亡与启蒙的冲突。由于救亡的迫切性，启蒙只能为其让路，这意味着民族主义战胜了西化，而民族主义在文化上的表现是民族文化本位主义。“五四”以后，引进西方文化变为引进苏俄文化（东方化的马克思主义）或重建中国传统文化，正是民族主义高涨的结果。只有胡适仍然坚持西化主张，坚持其世界化立场。这种主张和立场有悖于时代潮流，但经过历史的否定之后，在

今天，历史不是以某种方式又给予肯定了吗？

“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科学、民主旗帜，企图以西方现代文化对民众进行启蒙，其实质就是以个体价值来对抗传统文化的集体理性。“五四”以后，救亡压倒启蒙，新的集体理性取代个性解放思想。“五四”启蒙者或者转向共产主义（如陈、李、鲁等），或者转向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如吴稚晖等），胡适却仍然坚持自由主义立场。尽管在革命洪流面前，胡适的个人主义显得那么苍白无力，在国共两党斗争中他两面受敌，形影孤单，仍不改初衷，宁愿做“五四”传统的孤独的守望者。历史曾经抛弃了他，但最终又公正地承认了他。任何深刻的思想都不会浮在历史的表面上，它是历史的沉淀物。“五四”传统并没有被历史埋葬，科学、民主的旗帜在半个多世纪后又高高飘扬，无论是在中国大陆还是在中国台湾省，都证明“五四”精神仍然是时代的旗帜。因此，胡适作为“五四”传统孤独的守望者，他的工作并不是没有意义的。

100多年以来，中国处于不断的革命之中，革命成了“历史前进的火车头”，革命意识深入人心，激进革命传统根深蒂固。胡适却一直是一个社会改良主义者，文化渐进主义者，他不赞成激进革命。他认为，中国社会不能靠一场革命根本改造，只有靠一点一滴的改良和文化积累，中国才能缓步走向现代化。“五四”时期，胡适虽然首倡文学革命，但也与陈、李等激进派有所区别，他注重文学形式和语言的改造，并称之为“文学改良”，而陈、李等则注重思想上的革命（如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五四”以后，文化保守主义与文化激进主义两大思潮对峙，胡适却独守改良主义，既不赞成独裁专制，又反对暴力革命。尽管社会革命潮流把改良主义抛在一边，国民党又顽固地拒绝改良，但胡适仍知其不可而为之。“五四”时期，《新青年》同人曾约定20年不谈政治，专注学术研究，致力于启蒙宣传。可是革命风潮一起，多数启蒙主将都投入其中，启蒙传

统中断。胡适在这种情形下仍然坚韧地从事学术研究，寄希望于长期的启蒙之效。这种社会改良主义、文化渐进主义虽然不合时宜，但并非全无价值。革命与改良，激进与渐进本是社会进步的双翼，正如哲学上讲的质变与量变一样。或者革命、或者保守，这是一种片面的思维方式。当革命与文化激进主义完成历史使命后，改良与文化渐进思想的合理性就显现出来。现在，中国大陆与中国台湾省都摆脱了激进革命模式，走上了有序变革的道路，这也许是对胡适的历史遭遇的一种补偿吧。

今年研究胡适，不仅为了历史，也为了现实。改革开放时期与“五四”时期的历史情境有某种相似性。在80年代启蒙时期终结后，90年代是文化激进主义退潮、文化保守主义高涨时期，许多当年启蒙主将纷纷放弃启蒙立场，或转向新儒学或转向新保守主义，这令人想起“五四”以后的儒学复兴与新保守主义的高涨。这个时期，最需要坚守启蒙立场，最需要韧性战斗，宁肯不合时宜、宁肯孤独无助，只要保留思想火种，经过长期文化积累，中国的现代化就会到来。这也许就是胡适给我们的启示，也是宋剑华《胡适与中国文化转型》一书的意义之所在。

1996年2月3日

海南省社会科学研究资助课题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6年·哈尔滨

目 录

序.....	(1)
绪论 走向时代的辉煌.....	(1)
第一节 胡适民主主义思想的形成.....	(1)
第二节 胡适实用主义哲学思想剖析	(14)
第三节 胡适与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	(33)
第一章 胡适与“五四”文学革命	(48)
第一节 中西方文艺复兴运动的比较	(49)
第二节 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前夜	(58)
第三节 胡适文学革命理论的意义解构	(68)
第四节 胡适对文学革命的实绩贡献	(80)
第二章 胡适的文艺美学思想	(86)
第一节 平凡的经验与艺术真实论	(86)
第二节 思想情感与创作意境说	(92)
第三节 艺术的魅力与悲剧净化说	(98)
第四节 审美意识的民族性和时代性.....	(104)
第五节 新文学写实主义的积极倡导.....	(108)
第三章 胡适的新诗创作.....	(117)
第一节 胡适对新诗运动的理论导向.....	(117)
第二节 胡适的新诗与“五四”时代精神.....	(125)
第三节 胡适新诗创作的艺术追求.....	(130)

第四章 胡适与中国现代的话剧运动	(142)
第一节 “文明戏”兴衰的历史启示	(142)
第二节 “易卜生主义”——中国话剧运动的 第一个冲击波	(154)
第三节 《终身大事》与中国话剧文学的诞生	(167)
第四节 胡适对中国话剧艺术的影响	(176)
第五章 胡适的古典文学研究	(180)
第一节 “整理国故”与新文化运动的必然要求	(181)
第二节 中国文学史编写程式上的全面突破与 创新	(186)
第三节 “人民性”——胡适文学史观的核心论 点	(194)
第四节 “干预”与“参与”——胡适对中国古典 写实主义本质的高度概括与总结	(200)
第五节 “母题”的扩展——胡适对中国古典 章回小说历史演化轨迹的独特认识	(207)
第六节 “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对胡适 古典文学研究方法论的价值估评	(213)
第六章 胡适与“新红学”	(219)
第一节 “旧红学”研究状况的概述	(219)
第二节 胡适对《红楼梦》的考证研究	(224)
第三节 胡适对“新红学”的影响	(233)
第七章 胡适与中国现代文化	(241)
第一节 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论战的历史回溯	(241)
第二节 中国与世界:胡适对于文化的概念如 是说	(252)
第三节 历史与现实:胡适对民族传统文化的	

辩证态度.....	(257)
第四节 撞击与组合:胡适关于中西方文化交 流的理性原则.....	(264)
第五节 文化的时代走向:对于胡适文化建设理论 的理智思辨.....	(269)
后记.....	(274)

绪论：走向时代的辉煌

胡适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之一，也是 20 世纪中国文化现代转型过程中的一个关键性的人物。他曾用“科学”与“民主”的精神，点燃了新文化运动之火，创造了中国文明发展史上的又一辉煌时期。他的名字，也曾同变革精神融为一体，成为那个时代锐意进取的光辉典范。所以，我们对于这一复杂历史人物的评价，也不能脱离特定的时代背景；否则，这一形象也会因其失去了原有的历史平衡感，而变得无法理解和接受。

第一节 胡适民主主义思想的形成

胡适，字适之，一字嗣康，号冬友，行名洪驊，安徽绩溪上庄人，1891 年 12 月 27 日出生于上海。胡氏家族，本是皖南一带的名门望族，声誉很高，但是等到胡适降临人世的时候，家道已经衰落。所以，他并没有过上那种锦衣华冠的贵族生活，而是混在小康人家的孩子群中，接受着平民主义的思想教育。从童年到青年，胡适的思想在走向成熟的漫长历程中，先后经历了三个不同层次的发展演进阶段。

1. 九年封闭式的家乡私塾教育

胡适接受文化教育是比较早的，当他刚刚脱离了母亲的襁褓，便带着满身的奶气味被人抱着“爬”向了知识的海洋。那年他才三岁，正值国内思想界发起的维新变法运动的呼声“甚嚣尘上”之时。但是，这股盛行于上层知识分子的社会变革风潮，并没有波及到偏远闭塞的皖南山村。因而在程朱理学的故乡，胡适最早得到的思想启蒙教育，还不是“新学”思想的开导，而是理学教义的熏陶。程朱理学作为传统儒学的一大发展，它的核心基点是“天即理也”，“天不变道亦不变”，把儒学思想演变成了神话的教条。当然，幼小的胡适对于“理”与“道”这两个高深玄妙的字眼并不理解，可是他对朱子“格物致知”、“即物而穷其理”的治学态度和方法，却发生了极大的兴趣。“格物”、“即物”，是要人们到具体事物中躬身观察；“致知”、“穷其理”，则是告诫人们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寻找和掌握事物内在的本质规律。程朱理学曾用“理”与“道”的观念束缚中国人的思维长达几百年之久，却未能锁住一个不肯安分守己的幼小灵魂：20年后，胡适正是运用程朱理学中的合理因子，彻底击败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欺世谎言。可以说，“格物致知”的方法论，对胡适一生的思想见解和学术生涯，都给予了极大的影响。

除了程朱理学以外，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的胡适，还从范缜、司马光那里得到过无神论思想的启迪。尤其是范缜关于“形存神存，形亡神亡”那充满着唯物论精神的论述，使胡适解除了对死亡的恐惧及对鬼神的敬畏。他在《四十自述》一文中曾回忆道：“司马光的话教我不信地狱，范缜的话使我更进一步，就走上了无鬼神的路。”因为“我小时听惯了佛家果报轮回的教训，最怕来世变猪变狗，见了范缜不信因果的譬喻，我心理非常高兴，胆子就大的多了。”这使胡适的思想发生了一次小小的飞跃：有一天，他竟背着族人偷偷跑

到村边的破庙里，把族人供在那里视为神灵的菩萨塑像拆了下来，统统“抛到毛厕里去”，干了一件惊人的叛逆之举。当然，事情败露之后，他挨了母亲的一通痛打。

胡适的天份很高，并且敏而好学，对任何事物都充满着好奇心。随着年龄的增长，塾学里所教的那些古代先哲们的圣言遗训，已满足不了他那强烈的求知欲望；于是，他便背着师长杂学旁收，用了大量的时间去阅读那些被封建文人斥为是“海盗海淫”的通俗小说。“从《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五虎平西》、《粉妆楼》一类最无意义的小说，到《红楼梦》和《儒林外史》一类的第一流作品”（《四十自述》），都成了他所涉猎收藏的对象。这些小说中所涵括的丰富广博的社会人生内容，大大拓展了胡适的眼界，不仅在他幼小的心灵深处萌发了平民主义的思想因素，同时也直接培养了他对文学的兴趣，使他得到了良好的白话散文的训练。这一切，无疑为胡适后来发动文学革命运动，积淀了丰富的底蕴。

九年封闭式的家乡塾学教育，虽然替胡适打下了一定的“国学”功底；但是，不断膨胀的求知欲望，使他变得愈来愈躁动不安。每当外出归来的人眉飞色舞地讲述山外边那令人神往的新奇世界时，对他都是一次强烈的诱惑。新安江湍急的激流，也早已卷走了他那颗放荡不羁的心。13岁那年，小胡适终于征得母亲的同意，跟随着外出经商的三哥，沿着蜿蜒崎岖的山间小路，告别了童年时代的摇篮，走出闭塞落后的山村，来到大都市上海，开始接受现代文明的精神洗礼，并由此走向了世界。

2.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启蒙教育

胡适在上海读了七年中学，此时正值本世纪初叶中国思想界围绕着民族前途出路问题而展开的那场广泛而热烈的大论战。一时间，各种各样的思想学说，充斥着理论界，造成了空前繁荣的景

象。胡适那双陌生而饥渴的眼睛，在光怪陆离的社会思潮与五彩斑驳的理论学说中间，多方流览、尽情吸吮；而唯独梁启超的《新民说》和赫胥黎的《天演论》，对他产生的影响最大。这是他在思想走向成熟的转变时期，所受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潮的第一次冲击。胡适在谈及梁启超对他思想的深刻影响时，曾满怀深情地说：

我个人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现在追想起来，有两点最分明。第一是他的《新民说》，第二是他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梁先生自号是“中国之新民”，又号“新民子”，他的杂志也叫做《新民丛报》，可见他的全副心思贯注在这一点。“新民”的意义是要改造中国的民族，要把这老大的病夫民族改造成为一个新鲜活泼的民族。

.....

他指出我们所最缺乏而最须采补的是公德，是国家思想，是进取冒险，是权利思想，是自由，是自治，是进步，是自尊，是合群，是生利的能力，是毅力，是义务思想，是尚武，是私德，是政治能力。他在这十凡篇文字里，抱着满腔的血诚，怀着无限的信心，用他那支“笔锋常带情感”的健笔，指挥那无数的历史例证，组织成那些能使人鼓舞，使人掉泪，使人感激奋发的文章。（《四十自述》）

的确，梁启超在中国近代思想界所产生的巨大魔力，是无人可比的。他激昂慷慨、光照时代的言词思想，几乎完全主宰了当时社会的理论讲坛。生活在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凡是有血性的，没有不受他的影响或指染的。但梁启超对中国近代思想史的最大贡献，主要还是他对中华民族“旧我”形象所做的深刻而富于理性的总结。他的《新民说》，也首开近、现代关于“国民性”研究的先河，具有

深远的历史意义。梁启超曾直言不讳地说：“余为《新民说》，欲探求我国腐败堕落之根源，而以他国所以发达进步者比较之，使国民知受病所在，以自警厉，自策进，实理论之理论中最粗浅、最空衍者也，抑以我国今日未足以语于实事界也。”^① 梁启超以宏阔的视角，对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文化做了纵深的考察。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之所以止步不前落后挨打的根本原因，是因全民族受“数千年之旧毒”的熏染太深，自上而下形成了一种严重的病态心理。其具体的表现可归结为“六性”：

一曰侥幸性。才智之徒，不务利群，而惟思用险势之心术，攫机会以自快一时也。二曰残忍性。草薶禽弥之既久，司空见惯，而曾不足以动其心也。三曰倾轧性。彼此相阅，各欲得而甘心，杯酒戈矛，顷刻倚伏也。此三者桀黠之民所含有性也。四曰狡伪性，朝避猛虎，夕避长蛇，非营三窟，不能自全也。五曰凉薄性。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子至亲者尚不暇爱，而遑能爱人，故人质所丧渐灭以至于尽也。六曰苟且性。知我如此，不如无生，暮不保朝，假日偷乐，人人自危，无复远计，驯至与野蛮人之不知将来者无以异。此三者柔良之民所含有性也。^②

梁启超认为，国家本是由民众建构而成，因此救国须先着眼于治“本”，其首要任务在于除去“四百兆之痼疾”，兴办新教育、创作新小说，造就大批能以天下为己任的“新民”，然后才会有朝气蓬勃的

① 梁启超：《新民说·新民议》，载《新民丛报》1902年11月第21号。

② 梁启超：《新民说·论私德》，载《新民丛报》1902年11月第21号。

“少年中国”之崛起。梁启超的《新民说》，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影响极大。胡适从中认识到了国民性形成的历史根源及其长久性，从而决定了他以后所奉行的文化变革与社会改造的渐进革命论的思想。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思想，更是直接导源于梁启超的《新民说》。至于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政治革命家，也从未否定过梁启超对他们思想的启蒙。

梁启超的《新民说》，不仅使胡适了解了中华民族的历史积弊，同时也使他了解到“中国之外还有很高等的民族，很高等的文化”（《四十自述》）；而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则又使他看到了世界发展的整体趋势和中华民族面临的现实危机。他说：

《天演论》出版以后，不上几年，便风行到全国，竟做了中学生的读物了。读这书的人，很少能了解赫胥黎在科学史和思想史上的意义。在中国屡次战败之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这个“优胜劣败”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的棒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的刺激。几年之中，这种思想像野火一样，燃烧着许多少年人的心和血。“天演”“物竞”“淘汰”“天择”等等术语都渐渐成了报纸文章的熟语，渐渐成了一班爱国志士的口头禅。（《四十自述》）

“胡适之”这个名字，就是受进化论思想的影响而起的，意思是指“适应时代、适应生存”。在这一动荡沸腾的年代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思想，猛烈地燃烧着胡适的心。他再也按捺不住自己激动的情感，从旁观者的行列里一跃而起，积极投身于启蒙运动的洪流中去。他在上海公学办起了一份《竞业旬报》，发表时论文章，抨击那“恶人益多，民德日落”的腐败社会；他还创作了长篇白话小说《真如岛》，“用意是‘破除迷信，开通民智’”，宣传民主与科学的思想。